

# PTT 推文與歧異文化：Mob-ility 作為游擊戰

曹家榮

黃厚銘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 摘要

本研究試圖指出 PTT 鄉民於「推文」中展現了帶有反規訓意涵的歧異文化。觀察作為 PTT 使用者的鄉民們的實作活動，經常可以看到各種類型的「起鬨」現象。在本研究看來，這些「起鬨」不僅是導因於「愛恨交織」情愫的「流動群聚」(mob-ility)，更是 Michel de Certeau 筆下那種無法化約的多元、歧異文化之展現。換言之，諸如反串文、電影台詞推文、接龍文等經常在推文中擾亂既有板面秩序的實作，一方面既反映出愛湊熱鬧的鄉民們仍不願就這樣與體制或是講求一致的集體靠得太近，另一方面也彰顯了一種「不必然如此」的他者生產模式。循此，本研究也主張，從 PTT 推文的歧異文化中，或許看見的也是資訊時代中一種以「多元性」為基礎的解放可能。

關鍵字：PTT 推文、反規訓、流動群聚、歧異文化、多元性

The phenomena of post-pushing and the diversifying culture of the PTT: Mob-ility as  
guerrilla warfare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how the pluralistic culture and “anti-disciplinary” practices exhibited by the post-pushing of the PTT users. As we can see, the mobs (namely the PTT users) appropriate the post-pushing to rabble occasionally. We contend that the rabbling not only reflects the “mob-ility” caused by the ambivalence of postmodernity (liquid modernity), but also manifests the irreducible, pluralistic culture described in the books of Michel de Certeau. In other words, the rabbling, such as the disguising, the post-pushing of movie lines and the word-chaining, means the mobs’ ambivalence toward conformity and also the mobs’ cultural production which is unseen for its being belonging to the order of “others”. This production of “others” reveals that the practices on the PTT is “trying to be not necessarily so”. Accordingly, in the end our contention is that the “plurality”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basis o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ge.

Keywords: the post-pushing of the PTT, anti-disciplines, mob-ility, pluralistic culture, plurality

## 壹、序言：網路，封閉還是開放？

隨著網際網路成為當代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媒介之一，關於它的發展將會為人類自身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之討論就從未停止過。1990 年創立的「電子邊境基金會」象徵著對於網路開放與自由的捍衛。顯然地，從「邊境」一詞所意圖延伸出的隱喻正是，網際網路不單單是一種科技，它更帶來了一個全新的、尚未被馴化的生活世界。然而，時至今日，網際網路可以說不再是「邊境」，而是已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諸如 Sherry Turkle (1995)、Howard Rheingold (2000) 等人的研究，都已指出了今天人們是如何同時也「生活」在網際網路之上。問題在於，這樣一種「線上生活」在今天似乎難以說是一個自由、開放的邊境。實際上，在各種資料庫、監控技術以及相關的法令規定下，線上生活反而越來越像是受規訓日常生活的延伸。例如，去年在台灣就曾經發生政府企圖封鎖所謂境外侵權網站的爭議。雖然該法案在民間反對聲浪中被迫放棄，但後續又出現「電信法修正草案第 9 條」<sup>[1]</sup>，顯見各種對於網際網路的管制意圖從未停止。

但同時，對於網際網路可能實現自由與開放的理念並未消失。近年來仍有不少研究探討著網際網路所蘊含的解放可能性。例如，一個相當新穎的觀點是林意仁 (2011) 以台灣最大的 BBS 站 PTT 為例，指出一種有別於 Habermas 公共領域的網路民主化意涵。藉由 Bakhtin 的狂歡節等概念，林意仁主張 PTT 鄉民<sup>[2]</sup>文化實際上內蘊著一種「對抗性公共」的可能性。本文企圖更進一步探究今日的「線上生活」如何可能實現自由與開放的理念。然而，不同於林意仁以民主化問題為核心，企圖介入「網際網路是否可能作為公共領域」這一爭議，本研究則聚焦於網際網路作為日常生活所可能展現出的「逾越」性質。換言之，本研究同樣以 PTT 為例企圖指出的是：鄉民們有著「流動群聚」(mob-ility) 特質的日常實作，在被系統限定的網路空間之中，實際上生產了多元、歧異的文化可能性。更清楚地說，所謂「流動群聚」<sup>[3]</sup>之特質意指的是，在當代液態現代性的脈絡下，

由於拉扯於自由與安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愛恨交織，鄉民們總是四處流竄、時聚時散於 PTT 各板之間。而本文的目的即是透過 Michel de Certeau 的理論觀點來掌握這樣的日常實作樣態，進而指出 PTT 鄉民於「推文」現象中所展現的歧異文化。

## 貳、日常生活的游擊實作：de Certeau

本研究主張，PTT 鄉民的日常實作實際上展現了 Michel de Certeau 筆下的那種日常生活的「游擊戰」。在當代法國社會學傳統氛圍的影響下，de Certeau 試圖探究的並不是日常生活的「秩序」問題，而是——我們或許暫可粗略地稱之為——日常生活的「生產」、「抵抗」問題。循此，在本研究中，參與 PTT 日常互動的鄉民們也就絕非從事著同質、一致的行動的「大眾」，而是總可能在各個不同的時機中生產出他者、歧異的文化。底下，我們先進一步說明 de Certeau 關於日常生活實作的理論概念。

### 一、反規訓與他者實作

與同時期的法國思想家 Michel Foucault 不同，de Certeau (1984: xiv) 認為，如果今天我們卻實生活在一個分類、監看與常規化機制無所不在的「規訓社會」中，那麼，

就更加迫切地需要去找出社會整體如何避免遭到化約的方法，找出是什麼樣的日常程序（同樣也是細微且平凡的）操弄著規訓的機制，並且在只為了逃離的前提下順從它們？最後，也要去找出是什麼樣的「操作方法」（ways of operating）在消費者（或是被宰制者）這端形成了一個對立面，對立於那無聲地組織了社會經濟秩序之基礎的過程。

在其經典著作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中，de Certeau 這樣主張著。從這一主張來看，我們可以說，一方面 de Certeau 確實同意 Foucault 將當代社會視為是一

個微觀權力無所不在的「規訓社會」；但另一方面，他也更進一步地追問著「反規訓」實作的可能性。換言之，就如同 Gardiner (2000: 167-168) 所指出的，對於 de Certeau 來說，規訓權力機制的擴散並不同於就完全抹除了「他者」，在常規化的實作軌跡之外仍然存在著一些較「不可見」的實作，它們在不同的情境條件下依然有其作用。亦即，即便規訓的實作在技術宰制的結構之中已成為了現代社會主要的組織程序，形成了日常生活常規化的制度與行為模式，但 de Certeau (1984: 48) 認為我們無論如何都無法將社會的運作化約為僅僅是如此「單一」的形態。實際上在這一常規化的實作程序之下必然總是存在著無數「其他的」——雖然沉默卻是多樣的——實作，它們為「差異」的假設保留了可能性。從而，前述所謂的「不可見」，所指的也只是從掌權者或顛覆權力結構的全盤對抗性觀點來看，因為無足輕重、無濟於事而顯得不可見。

循此，從 de Certeau 的觀點來看，日常生活也就並非「必然」只能循著常規進行。但這也不意味著人們總是清楚地在「對抗」著既有的秩序，毋寧地，de Certeau 所強調的是那些細微、甚至瑣碎的迴避、偏離與遁逃的實作。就如同 Highmore (2002: 151) 所說的，de Certeau 雖然將日常生活視為是抵抗的領域，但是這一「抵抗」(resistance) 並不同於對抗 (opposition)。<sup>[4]</sup>例如，de Certeau 即以「假公濟私」(la perruque) 為例說明了這種日常生活的抵抗。所謂的「假公濟私」也就是：工人在做自己的事情時卻偽裝成在幫老闆做事。...例如，像是一個秘書在上班時間寫情書，或是複雜一點，一個木匠「借用」工廠的車床幫自己做一件家具。(Certeau, 1984: 25) 在其中，無論是工人還是秘書都並不是要對抗、推翻既有的體制秩序。如同 de Certeau (1984: 30) 所言，這些不同的行動介入的是一個在第一層次上規制著它們自身的場域，但同時它們也導入了一種逆轉其優勢的方法，這個方法遵循著不同於此一場域的規則，並構成了就好像是某種第二層次的秩序，並且與第一層次交織在一起。

## 二、挪用：消費作為生產

相應於一種理性化的、擴張主義的、同時也是中央化的、聲勢浩大的、公開展示的生產，還有另一種我們稱之為「消費」的生產。後者是一種迂迴的、散佈於各地的生產，但是它卻是無聲無形地隨處滋長著，因為它並不藉其產物展現自身，而是透過使用（using）由支配的經濟秩序加諸於其上的產品的方式來展現自身。（Certeau, 1984: 31）

de Certeau 將「他者」的日常生活實作視為一種「生產」，但必須注意到的是，在 de Certeau 看來，這樣的「生產」(poiesis)並不是資本主義式的。正如 de Certeau (1984: xii) 自身所言，在這個由資本主義的生產系統所界定與占據的區域之中，我們所探討的是一種「看不見的生產」(a hidden production)，它們散佈在這個不再留給「消費者」任何空間的系統之中。循此，我們也可以看到 de Certeau 與其前輩們不同的地方：他既不認為消費者就是毫無抵抗能力、順從的大眾，也不主張任何以日常生活為基礎的宏大革命計畫。毋寧地，他關注的是那種被稱之為「消費」，但實際上卻可能無聲無形地隨處展現出異質的、無法被統一的文化的「使用」——作為一種「生產」。

換言之，這可以說是一種「挪用」。一方面，de Certeau 藉由此一「消費」的概念將「日常生活」、「大眾」等概念從「文化工業」的批判中拉了出來：消費者不再是被矇騙、無知、順從的大眾，而是可能透過各種操弄、使用的方式展現出多元的「生產」。因此，de Certeau (1984: 32) 認為，有別於 Baudrillard 的觀點，無論如何，消費者無法藉由其所吸收的報紙或商品來加以指認或限定：在人（使用產品的人）與這些產品（強加於人之上的「秩序」的指標）之間，存在著多樣比例の間距，這一間距正是由消費者的使用（using）所打開的。但另一方面，de Certeau 卻也不是要藉由這種「消費」建立起某種二元對抗式的想像。從 de Certeau 的角度來看，「消費」既不是「反生產」也不是「不生產」，而是一種不

可見的「他者」生產。因此，它既不是要取消生產——實際上，它本身正是一種「生產」；也不是要建立另一種「生產體系」——它根本無法留下任何「產物」，只能在「操作」(operating)、「做」(making)的過程中展現自身——而是要多元化「生產」本身。換言之，這種「生產」的意義僅在於「生產」本身，而不在於產出了什麼、有什麼結果。相較之下，汲汲營營於計較結果，反倒是更深陷於資本主義體制講究效率與利害計算的文化中。就如同 de Certeau (1984: xviii) 所說的：

作為不被承認的生產者、自身行動的詩人、身處於功能主義理性叢林之中發現自身路徑的沉默行者，消費者生產了某些遵循著自身邏輯的軌跡。...[消費者生產的]軌跡描繪了源自於他者旨趣與嚮往的策略，這些旨趣與嚮往既無法被它們於其中發展的系統所決定，也無法被其掌握。

這種「挪用」消費的生產之所以並非「反生產」的對抗性想像，還可以從 de Certeau 的另一組概念「戰略」與「戰術」來加以說明。de Certeau 雖然採用了這組看似二元對立的語彙，但如同 Buchanan (2000: 86) 所言，若是將這組概念誤認為圍繞著權力而建立的、邏輯上對立的概念，那恐怕就誤認並弱化了 de Certeau 這組分析工具。簡言之，用 de Certeau (1984: 36-37) 自身的定義可以清楚看到：「戰術」...所運作的地方屬於他人。戰術使自身滋長於他人的地方之中，它是零碎地、不全面地、也無法拉開距離地於其中滋長著。而 Highmore (2002: 159) 的詮釋也指出，戰術並不是在它們所遭遇的戰略之外運作，如果是這樣的話它便成了一種「反戰略」(counter-strategy)，實際上戰術是處於一個曖昧、含混的位置上，它是在內部的「他者」。用 Lyotard (1984: 16) 的話來說，若戰術只是種反步法 (countermove) 仍只是受制於對方的戰略，但既然是佔有地盤的強者才可能擁有戰略，那麼若不能發揮想像、徹底擺脫強者的觀點，其結果將是越限越深，及至動彈不得。

也就是說，他者的日常生活實作作為一種戰術實作，絕非那種能夠擁有堅實陣地、面對面直接對立的反抗，而是四處游散、伺機而動的小游擊戰。它不僅無法掌握空間的計算，甚至無法看清整體的局勢，僅能透過巧妙地掌握時間(時機)才能夠於其中窺見自由。然而其存在的意義就在於，如同 Buchanan (2000: 89) 所說的，它們在日常生活中證明了戰略控制的偏頗，在這樣做的同時，它們也懷抱著象徵性的希望，也就是無論事態變得多糟，它們也不必然要如此。回過頭來說，從「戰術」的角度來理解 PTT 鄉民的實作，也就能夠進一步看到，其流動的群聚 (mob-ility) 其實正是彰顯出這種「沒有逃離的逃離」的含混樣態。換言之，鄉民們並非要顛覆既有的系統秩序以建立「專屬」的網路空間，毋寧地，他們乃是依賴著時間來生產出「不必然如此」的偏移。

#### 參、PTT 鄉民的游擊實作

PTT 乃是目前台灣 (亦是全球) 最大的電子佈告欄系統 (BBS)，每日均有約 10 萬人同時在線。它以在今天看來「低科技」的技術基礎，卻吸引了廣大的使用群眾，這個事實本身就已是一個值得探究的社會文化現象，李紹良 (2012) 即曾完整地分析了 PTT 如何壯大與持存的社會歷史過程。在此，本研究則著眼於文化面向，主張 PTT 不僅是一個文字界面的電子佈告欄系統，它更是諸多鄉民生活於其中的日常生活空間。而透過對於此一線上生活空間的觀察，我們將可以看到 PTT 鄉民們的日常實作實際上總是在逾越著各種規範與限制。

如同李紹良 (2012) 在其 PTT 的歷史研究中指出的，PTT 之所以能夠如此壯大並持存於今天這個網際網路時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 PTT 鄉民之間的互動文化。作為一個電子佈告欄系統，PTT 並不只是單純提供了資訊交流的管道，更重要的是鄉民們得以「群聚」於其中，甚至經常參與各種大大小小的「起鬪」事件。黃厚銘與林意仁 (2013) 更以「流動的群聚」(mob-ility) 這一概念來說明 PTT 鄉民們的起鬪現象。簡言之，在他們看來，PTT 上經常會突然出現的各



種起鬨現象，正是現代人游移、矛盾於個人與社會、自由與安全的愛恨交織關係時，所展現出來的集體情緒能量。這些起鬨現象往往一哄而散，但卻也實實在在地讓參與者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共感共應。

本研究在此同樣也著眼於這些帶有「流動的群聚」特質的起鬨現象，然而不同於先前的研究，在此我們企圖指出的是這些起鬨現象中所展現的「他者」實作。也就是說，相較於 PTT 系統站方、乃至於主流的文化與規範，這些鄉民們往往如 de Certeau 所說經常伺機展現了多元、異質的文化樣態。這些起鬨不見得是要顛覆 PTT 這個站台本身的「治理」，毋寧的它更像是那些底層的、多元文化的短暫爆發。鄉民們緊抓著治理者（各板板主）不注意的空隙，甚至也從未考慮過能夠造成什麼改變，一個個不約而同地「湊熱鬧」起來。在本研究看來，正是這些平凡的、甚至看似雜亂的實作突顯了「不必然如此」的可能性。

#### 一、迴避，各種酸與反串

這些被殖民者顛覆了殖民者的文化，但不是藉由拒斥或是改變它們，而是藉由在使用它們時關聯於不同的目的或是參照於不同的系統來完成。這些被殖民者是這個從外在將其吸收的殖民中的他者，他們無力於挑戰支配者，但卻可以挪用其力量；他們雖然無法離開，卻逃離了此一支配的秩序。(de Certeau, 1984: xiii)

PTT 作為一種 BBS（電子佈告欄系統），當然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大體上來說，PTT 是由各個「板」所組成的——例如八卦板（Gossiping）、黑特板（Hate）等等。受限於 BBS 的文字界面，每一個「板」又皆是由以時間序列為基礎的條列式文章所構成。最後，在每一篇文章之中又可分為主文及推文兩大部分。主文由原作者撰寫並可修改，推文則供觀看文章的鄉民回應之用。推文同樣依照時間順序條列，並分有「推」、「噓」、「→」三種標記。在通常的情況下，「推」代表

贊同原作者的文章或觀點，「噓」則代表不認同。「→」標記則意味三種可能情況：

(1) 不置可否，單純發表意見；(2) 原作者自己推文；(3) 在短時間內連續推或噓文。

除了上述這些板面上的配置外，更重要的是，PTT 乃是由板主、組長、站長等管理階層所治理的「地方」。換言之，PTT 並非毫無規範的「電子邊境」。實際上，PTT 除了受限於台灣學術網路規範外，每一個「板」之中同時也針對個別板自身的性質訂有「板規」，並由板主群統一管理。以八卦板為例，其板規便有六章二十二條之多，其中不僅規範了發文內容、格式，也針對推文有管理細則。不合規定的文章不僅會被板主刪除，發文者還可能被「水桶」——也就是取消發文與推文權限。循此，我們可以這麼說，實際上 PTT 的每一個「板」不僅用以提供鄉民們在特定旨趣下互動與分享資訊，它同時也規範著鄉民們如何從事這些行動。

然而，我們可以看到，作為使用者的鄉民們並非總是遵循著既有的規範與秩序。特別是在推文中，經常可見看似違反板規的語句出現。舉例來說，在 NBA 板的板規中，具體明訂了發文及推文的限制，其中包括了：「不得以看板板面為工具，行惡意攻擊 特定球員/球隊/板友之實，或挑起特定球迷之間之爭端。對於遭受人身攻擊之板友，若其原言論並無任何爭議，則板主有權加重攻擊者之處分。」但實際上，例如，在 2013 年 12 月 13 日一場火箭隊對上拓荒者隊的比賽 Live 文中，便出現了如下列這些推文：

推 danxxx46: Golf Jane 的運球真的很像殘廢...有夠不協調

→ MVxxxxest: 鬍子太慘了

推 Kxxxn :放槍，爛透了

推 linxxxxxuin :=====鬍子就是個廢物^\_\_\_\_^=====

推 scxxx3: LOH<sup>[5]</sup>高潮了 小心被水噴到~

這些推文或多或少都夾帶了惡意攻擊球員、或挑起爭端的意圖。然而，這些推文者並無意於直接挑戰板規，或甚至試圖顛覆 NBA 板的秩序。這些推文者既沒有發文高舉革命，也無意透過行動癱瘓板面運作。相反地，他們熱衷於參與每次實況播出的 Live 文討論，但卻也總是在推文之中偏離既有的秩序與規範。

借用 de Certeau 的話來說，這些近似謾罵、挑釁的推文也就是那些無法被抹除的異音與差異。換言之，當 NBA 板板規企圖透過規範讓鄉民們成為理性的討論、評論者時，實際上卻總是無法完全化約人們的差異。而鄉民們也並非要正面對抗既有的規範，而更像是游走在灰暗地帶般，透過迴避來逃離。例如，上述推文中的「Golf Jane」，實際上影涉的是被禁止的「高富奸」一詞。後者被認為是對於火箭隊球員 Chandler Parsons 的惡意攻擊。透過 Golf Jane 這樣的一種變形、轉換，推文者企圖在迴避板規的規範同時實現其「酸」球員的意圖。進而也隱含著對於版規的嘲諷或抗議。又或者，在實況轉播的 Live 文中，經常可以看到一種「反串文」<sup>[6]</sup>，例如：

推 bxxxxst := 全部都是 lin 的錯，哈登超強!!! =

推 sxxxx3: 鬍子是老大耶都怪你門這 LOF~ 一定是 LIN 的錯

→ bxxxxst := 都是 lin 沒補防，哈登神防守好嗎=====

在這類型的推文中，看似在稱讚某一個球員——因此沒有惡意攻擊的意圖——但實際上卻是一種「反串」，也就是在「酸」、嘲諷這一名球員。實際上「哈登」或「鬍子」這名球員經常被人詬病的即是防守不夠努力，然而從推文中我們看到的卻是稱讚他而怪罪 Lin（林書豪）。藉此，推文者迴避了可能被冠上惡意攻擊的罪名，並實現其嘲諷的目的。就如同 de Certeau 所說的，這正是一種日常生活實作的抵抗。透過參照不同的目的與旨趣，這些推文者雖然沒有違反板規，卻仍然擾亂了既有的秩序。甚至，不明究理的人還可能誤以為推文者是真心地在稱讚某球員。

當然，並非每次迴避總是成功，例如下列幾位推文者最終還是難逃「水桶」的處分：

推 nxxxxxpy:林就癢才會在板凳

→ Rxxxxa:彌彌這兩場夠崩潰了 別再刺激他們了

→ Rxxxxa:本來希望火箭輸的 結果都贏的很漂亮只好崩崩

→ txxxxxd:貝酸又要崩潰惹

這些案例顯示了，一方面，它們確實是無法被既有秩序容許的他者、異音，因而各種迴避的戰術僅僅只能讓它們短暫地取得勝利，最終仍可能難逃被抹除的下場。另一方面，雖然治理者（板主）持續透過「水桶」的威脅——也就是取消鄉民們參與互動的可能性——企圖常規化板內的行動與互動，但這些仍舊不斷冒出的異音與擾亂正顯示著多元與他者的不可化約性。

## 二、異質文化的召喚

掌握著板內文章保留、刪除以及鄉民們發言／推文權力的板主群們，借用 de Certeau 的概念來說，正像是佔有著專屬地方（proper）的治理者。就如同 Buchanan（2000: 89）對於「戰略」的詮釋，其運作在於限制影響我們的變項數量，其方法是創造某種保護區域，也就是一個即便不是馴服了環境也是使得環境變得可預測的地方。換言之，透過詳細規範發言格式、內容甚至頻率的板規，版主們使得每一個板內可能發生的事件都變得可以預測與管理。而鄉民們就如同 de Certeau 筆下的「他者」，只能在不屬於自己的地方中四處游竄。而「推文」的輕薄短小所蘊含的機動性，正是鄉民們伺機而動的最佳武器。在瀏覽板內文章的同時，鄉民們隨時注意著發文與推文的內容走向，並在即時回覆的推文行列中，匆匆地生產著各種異音與小擾動。他們是消費者，但也是「不可見」的生產者，生產著各式各樣的差異與可能性。

除了上一節中談到的那種，為了迴避既有板規而創造出的轉換、變形之外，在 PTT 鄉民的日常生活實作中，更展現了兩種主要的「生產」形式。首先，其中一種涉及的現象可以總稱為「電影台詞推文」。例如：

推 sxxxxxx4:回春堂朱小二表示:

推 jxxxxxxxx5:可能是小人記錯了 大人

→ lxxxxx:包龍星:記錯了?你幾個月以前記錯,你現在又記錯?...

推 kxxl:方糖鏡:說他記錯就記錯,大人快劍他

推 Exxxxxxxxa:荒唐鏡:等一下你們在鏡頭前,就說有聽到馬面喊連勝文

推 Lxxxxx:底下批踢踢電影台台詞推文

→ Lxxxxx:張無忌你還欠我一件事,你要救六大派,就回大都找我吧

推 uxxxxxxxxmu:我不希望阿麗跟垃圾在一起

推 xxxxxx4:在座各位都是

這些推文經常與原作者主文內容無關、或是以一種偏離原意的方式產生關連。例如，第一個例子中，原作者的主文轉錄的是一則標題為「馬面未喊連勝文 證人：聽錯」的新聞。在鄉民們看來，這一「聽錯」的轉折便令人聯想起周星馳電影《九品芝麻官》中的情節，於是便引發了一連串帶有嘲諷意味的電影台詞推文。而第二個例子的主文原先是一個猜謎的互動，標題為「[猜謎]九陽神功和乾坤大挪移」，但由於謎底「無計(無忌)可施」正好令人聯想到電影《倚天屠龍記之魔教教主》的主角，第一位推文者又推了一句「底下批踢踢電影台台詞推文」，其後便引發了連串的「起鬨」。然而，並不是所有電影台詞都可能引發這類起鬨。根據 PTT 鄉民百科的說法，其中最能夠引起 PTT 鄉民們共鳴的主要是以周星馳的電影為主——如《食神》的「得罪了方丈還想走」、「是洋蔥，我加了洋蔥」、「實在太黠

然、太銷魂了」、「好折凳」，《九品芝麻官》的「尚書大人真精靈」、「我是跟鄉民進來看熱鬧的」、「我空虛、寂寞、我冷呀」，《破壞之王》的「我是說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放開那個女孩」。而非周星馳電影中又以周潤發的《賭神》最受歡迎，如「高義你他媽雜碎」、「公海到了沒」、「我佈這個局佈了一年之久」等等。

在本研究看來，這兩種類型的「生產」乃是一種異質文化的召喚。如同 de Certeau (1984: 30) 所說的，這些實作所構成的就好像是某種第二層次的秩序。但也因為並沒有完全推翻、改變既有的秩序，因此呈現出與第一個秩序相互糾結纏繞的現象。原先 PTT 作為電子佈告欄系統，其「推文」的互動設定是希望讓鄉民們能就原作者發文的主題進行討論。然而，對與 PTT 鄉民們來說，由於「推文」作為主文的附屬，一方面較為隱密，於其中的作為較不易被察覺，另一方面大量的推文經常讓人們有著「見縫插針」之感，得以把握時機「亂入」，故「推文」經常會演變為某種脫離主文脈絡的文本，展現出異質的文化召喚。循此，當某一位鄉民在推文中寫下了某句經典電影台詞時，這樣的行動也就是企圖在原先屬於原作者主文脈絡的場域中，混雜進異質、他者的文化生產。他無意於取代或取消原有的秩序，但如同 de Certeau (1984: 31) 所說的，這些「他者」就像是在教科書上亂畫、塗鴉的孩童，以一種偏離常規的方式標示了自身做為作者的可能性。

### 三、戲耍的挪用

另一種在 PTT 中經常見到的他者生產形式可以稱之為「戲耍的挪用」。簡言之，也就是 PTT 鄉民們挪用原先的「推文」，展現出各種戲耍的創造性生產。例如，原作者 Rxxxxu 在八卦板轉錄了一則新聞，標題為「[新聞]羅東櫻木花道 開了！」，雖然其原意可能是要分享賞櫻的消息，但由於「櫻木花道」同時也是一名籃球漫畫人物，這個新聞特殊的標題格式也就在推文中引發了大量與主文無關的推文，如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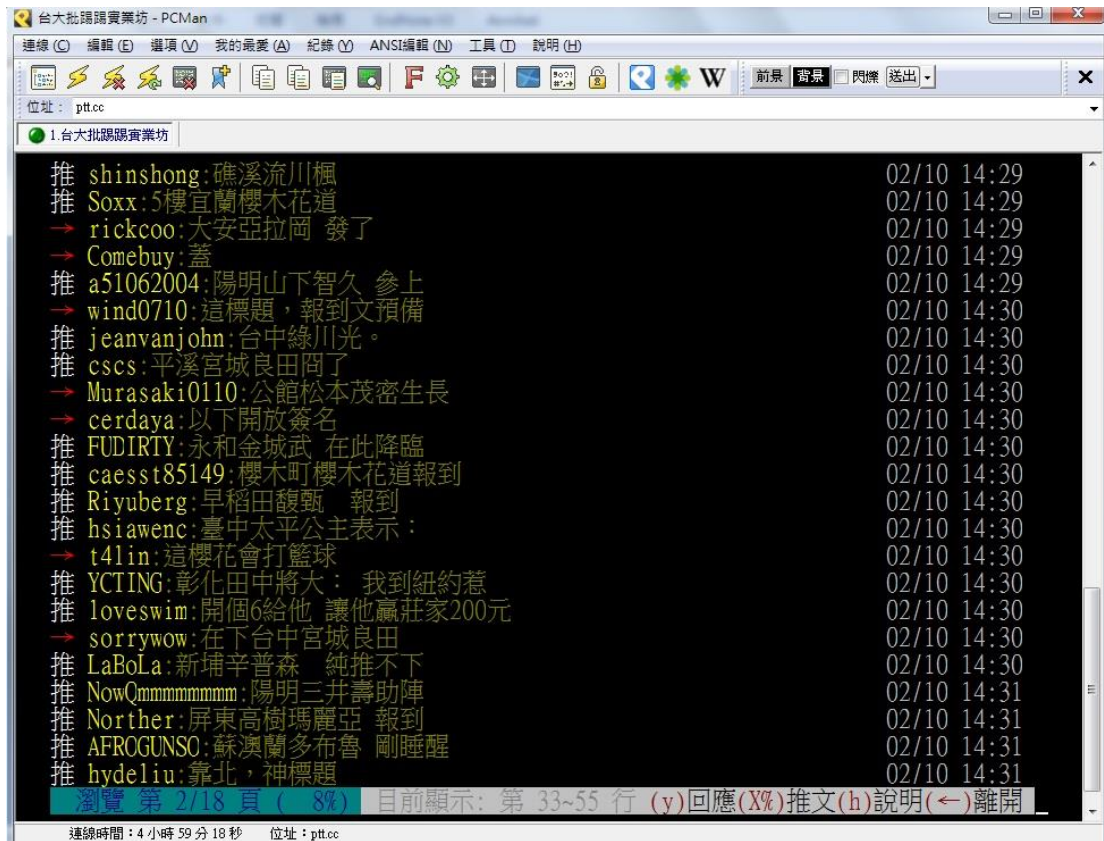


圖 1：鄉民們挪用推文生產出「報到文」接龍。

這種推文通常也被鄉民們稱之為「報到文」的推文接龍。另外一種挪用推文的接龍則更涉及了推文者之間的共謀合作：

- 推 dxxxxl159753:投
- 推 pxxxft:手
- 推 txxxxxxxxA:丘
- pxxxft:王
- dxxxxxxxx53:小
- wxxxxxxxxner:明
- 推 Axxxo:雞
- txxxxxxxxA:明
- 推 Fxx:八

→ txxxxxxxxxA:蛋<sup>[7]</sup>

不同於「報到文」，這類型推文的趣味來自於多個參與推文者共同創造出的產物。上述的例子是單純一人推一字的文字接龍。由於每一個推文者都只能「推」一個字，因此其文意乃是由所有參與者共同創作而成。但也正因如此，此種推文經常變得毫無邏輯可言。而下面的例子（如圖 2）則是類似與 PTT 上所調的「推齊」推文，但又結合了數字（七、八、九、十）的接龍推文。在這個例子中，開啟這一串推文的 vxxxxxp 實際上又同時是在其推文中隱晦地諷刺 NBA 球星 LeBron James 經常為人詬病的「走步」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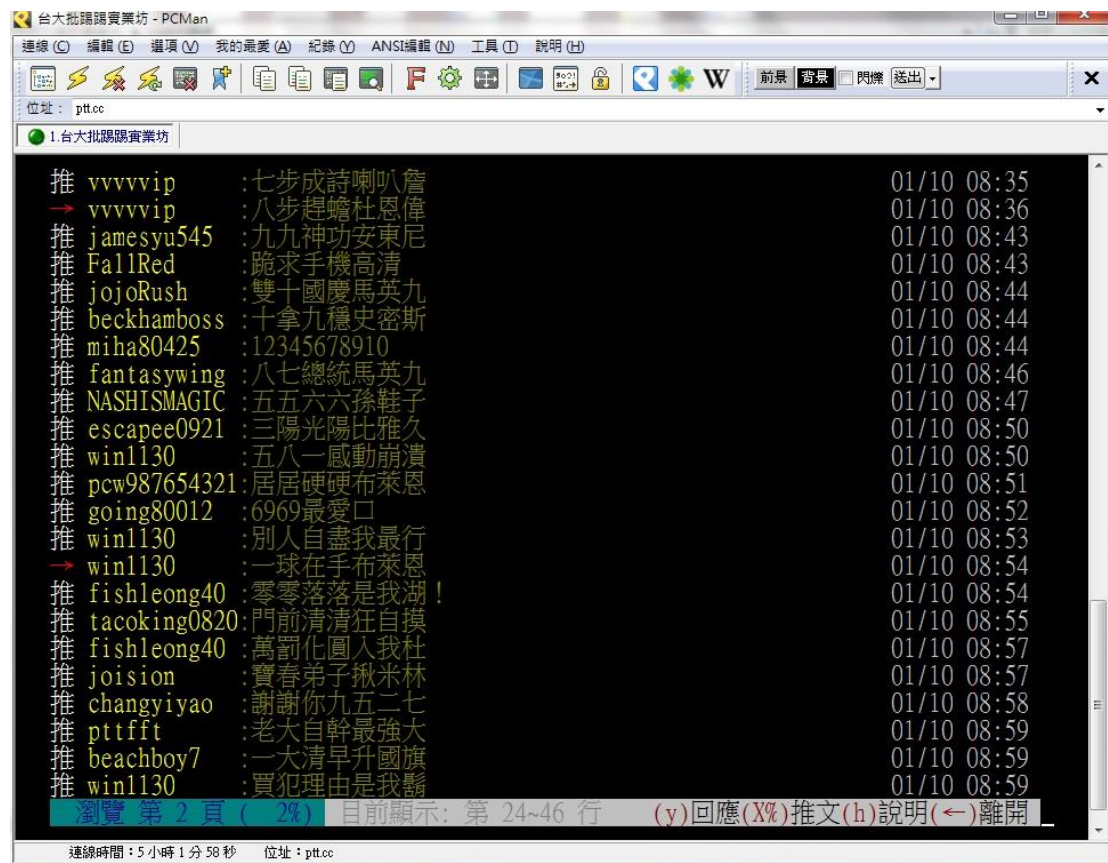


圖 2：推文者挪用推文生產出帶有「推齊」意涵的「接龍」。

此外，還有一種接龍推文也是共同創造的產物。如下圖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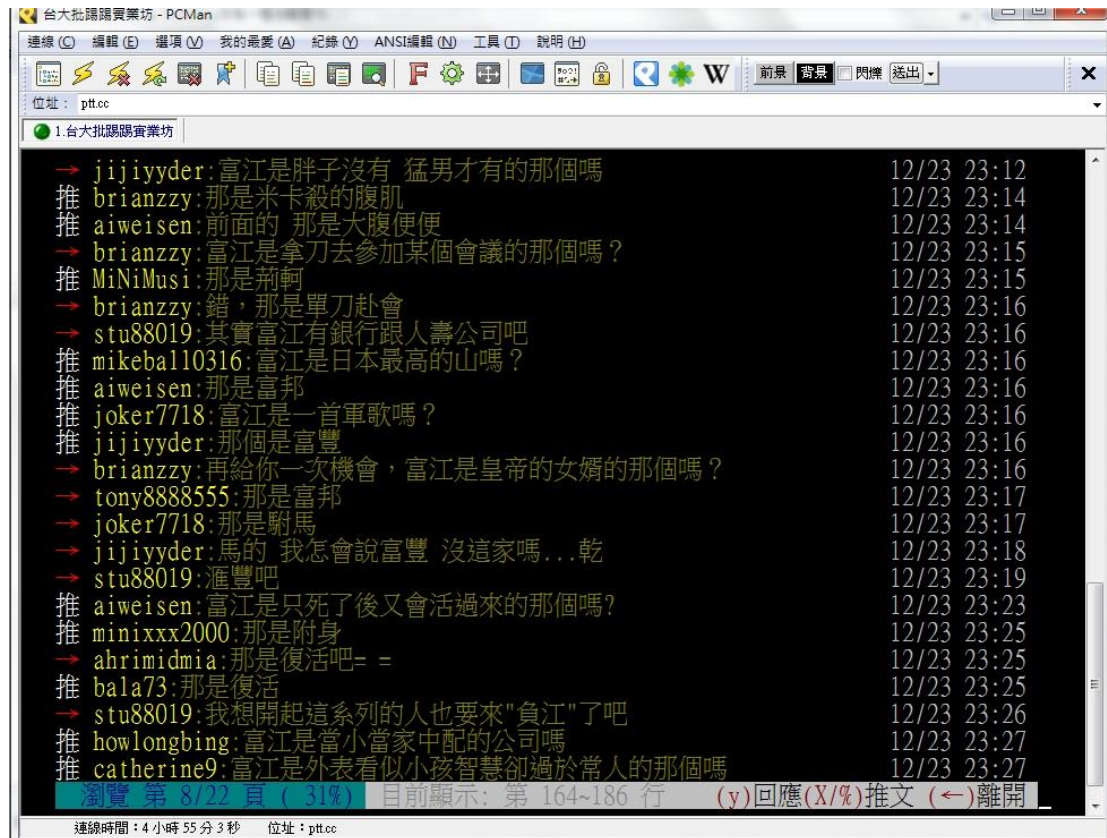


圖 3：從「美江」變成「富江」的接龍推文。

這篇文章的主文原為 joke 板的一篇回文，發文者原先是要藉由回應另一篇標題為「[趣事]剛剛去買雞排」的文章，來說笑話。但由於他在文中提到了「美江」<sup>[8]</sup>，而後第一位推文者又推了一句「為什麼我都會看成富江」，便引發了如上圖一連串的起鬨推文。實際上這一連串推文延續了近一個禮拜的時間（由 12 月 23 日晚上 06 點 33 分至 12 月 29 日下午 3 點 08 分），其間有超過 400 則的推文。這個例子較前述兩例更有共同創造的意味，因為它的形式乃是由一問一答所構成。

與異質文化的召喚不同的是，戲耍的挪用並沒有明確引導參與者浮現某種共同的記憶或文化想像——例如，周星馳的電影。因此，也可以說是一種更加無厘頭的創造與生產。參與推文者洞悉了「推文」這一既定的行動模式之中變異的可能性，也就是依時間序列排序的前後推文間可能共同組成特定意義的、或是有特殊相互呼應意涵的語句。循此，推文者即可能將其挪用、轉化，形成一種創造性

的再生產。頓時之間，如同 de Certeau 所指出的，這種即興演出的戰術，讓原本作為附屬地位的推文轉而獲得了優勢，甚至經常「反客為主」地備受注目。此外，借用黃厚銘與林意仁（2013）的觀點來看，這樣的挪用實作同時也展現了更加純粹的集體社交情緒的爆發。在毫無（功能性）目的的推文之中，PTT 鄉民們不僅獲得了群聚的共感共應，更同時展現了擾亂既有秩序的多元樣態。

de Certeau（1984: 98）在分析城市之中的步行者時，曾這樣指出：

如果有某種空間秩序確實組織了整體的可能性（例如，藉由一個人們可以移動的地方）與限制性（例如，藉由牆阻擋人們前進），那麼正是步行者落實了某些可能性。...以同樣的方式，步行者改變了每一個空間的意符（signifier）。

正如同城市之中的步行者，PTT 鄉民們遊走在這個被種種明確規範所限定的 BBS 系統之中。他們並未逃離，也沒有企圖顛覆既有的秩序。就像黃厚銘與林意仁（2013）指出的，鄉民們的「流動群聚」實際上源自於其背後「愛恨交織」的心理基礎。因此，PTT 鄉民們不僅是因為缺乏戰略位置而無法真正地顛覆既有秩序，更重要的是，「愛恨交織」的情愫意味的是，鄉民們對於這個系統提供的群聚可能性是嚮往的。然而，更加曖昧、含混的樣態是，也同樣是在因為「愛恨交織」的拉扯中個人不願與體制或是講求一致的集體靠得太近，PTT 的鄉民們才在一次又一次的「起鬨」中，展現了各種獨特、異質與多元的聲音。<sup>[9]</sup>此外，這樣的「起鬨」之所以可能，也正是因為鄉民們落實了「推文」系統的一種可能性。亦即，「推文」快速、簡短回覆的特性，以及依時間序列前後排列的模式，被挪用為鄉民們「起鬨」的戰術利基。作為附屬的、較不醒目可見的「生產」，鄉民們在推文之中創作出自身的獨特文化。而在本研究看來，這同時也就意味著，如同 de Certeau（1984: 48）所指出的，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將社會的運作僅僅化約為一種佔主導地位的程序。也就是說，我們總是可以看到 PTT 鄉民們一次又一次地

展現了如反串的迴避、異質文化召喚或是戲耍的挪用等這些偏離的實作形式。正是在這些日常生活實作之中，以「流動群聚」姿態生存著的 PTT 鄉民們落實了多元的可能性，不斷地在既有的常規秩序中夾雜著「不必然如此」的生產與創造。

肆、代結語：資訊時代的「透明」與「多元」

美國技術哲學家 Michael Heim (1993) 在討論網際網路發展的意義時，將網際網路視為是一種全知、透明的欲望的實現。在 Heim (1993: 89, 95) 看來，脫離了肉身限制進入網路空間的存有樣態，也就是實現了 Leibniz 以降的觀點，即人類的認識要仿效上帝的全知，也就是不再有延遲、即時的完全透明。無獨有偶地，義大利哲學家 Gianni Vattimo 在其經典著作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中也指出，現代性的核心乃是受到一種「自我透明」(self-transparency) 的烏托邦理念所導引。所謂「自我透明」的烏托邦理念，簡言之，也就是源自於現代理性的認識能力(啟蒙)的完全解放。(Vattimo, 1992: 18) 由這樣的理念所推動的傳播科技發展，在 Vattimo 看來，即是朝向加拿大傳播學者 Marshall McLuhan (1964) 所謂的「地球村」方向前進。

循此，網際網路在今天的發展，無疑地對於現代性「透明」理念的實現來說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然而，在 Heim (1993: 106) 看來，此一發展卻同時帶來了弔詭的後果。簡言之，完全的透明並未帶來自由與開放，相反地，它可能導致的是完全的監控。意即，伴隨著無限制、即時認識而來的同時也是總是被監看、檢視與審查的可能性。換言之，就如 David Lyon (2001: 108) 所指出的：

資訊社會的另一面也就是監看社會。電子連線的世界造成了雙重作用，它將地球村帶到我們面前的同時，也使得個人的資料得以被取得、處理、操弄與買賣...。

然而，網際網路的發展作為一種全知、透明欲望的實現，是否就意味著必然是一

種全面宰制的形成？雖然 Vattimo (1992: 23) 也認為，當社會的自我透明從純粹技術的角度來看成為可能時，這樣的自我透明顯示為一種宰制的理念而非解放...。但他同時也主張，在溝通系統自身內部，其機制的發展卻是使得自我透明的實現在原則上成為不可能。之所以如此，簡單來說，即是因為：資訊「市場」的邏輯要求持續的擴散，它便需要將「所有的事物」都變成溝通的對象 (object of communication)。大眾媒介最顯著的影響就在於此，它使得越來越多的次文化 (subculture) 隨著溝通的增生而發出其聲音。

也就是說，雖然同樣認為當代傳播科技發展的核心乃是一種「透明」的理念，Vattimo (1992: 4) 卻主張，實際上，大眾媒介...並未使得後現代社會更加「透明」，而是更加複雜甚至混亂，同時，也正是在這個相對的「混亂」中有著我們解放的希望。正是呼應於 Vattimo 這樣的觀點，本研究企圖透過 de Certeau 的理論概念，突顯 PTT 鄉民們各種多元、異質的日常生活實作所展現的「不必然如此」的可能性。PTT 鄉民們帶有「流動群聚」特質的日常實作，源於當代個體拉扯於個人與社會、自由與安全之間的「愛恨交織」情愫。以起鬪來創造歧異的作法也符應了 Vattimo 所謂的擺盪於有所歸屬 (belongingnes) 與迷離 (disorientation) 之間的解放之路。因此，鄉民們在 PTT 中四處遊蕩與見機「起鬪」的樣態，既不是企圖對抗、顛覆此一系統本身，但也不願「就這樣」完全地依附、順從著既有的規範與秩序。其展現出的種種迴避、異質文化召喚與戲耍挪用之實作，在在地顯示出多元、異質的獨特文化。更是在這些 de Certeau 稱之為「他者生產」的創造性之中，我們可以看到看似「混亂」之中的解放可能。如同 Vattimo (1992: 7) 所言，這樣的「解放」不再立基於啟蒙的認識之上，而是以「多元性」為其規範性判準。<sup>[10]</sup>也就是說，不再是企圖透過理性溝通的確保，而是經由盡可能地擴大多元對話的可能性，來尋求可能的出路。

## 註釋

- 〔1〕 此一法條內容包含：「利用電信網路向不特定多數人提供之內容，經各該法律主管機關認定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者，電信事業於技術可行時，應依各該法律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授權之通知，停止使用網路、移除內容或為其他適當措施。利用電信網路向不特定多數人提供之內容，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電信事業於技術可行時，得停止使用網路、移除內容或為其他適當措施。」故被認為乃是偷渡了先前被迫放棄的封網法案。
- 〔2〕 「鄉民」一詞乃是目前 PTT 使用者的泛稱。根據 ptt 鄉民百科 (<http://pttpedia.pixnet.net/blog/post/37958546>)，鄉民一詞最早出現在 2004 年，當時某板的板主在調解鬧板事件時，用了「請看熱鬧的『鄉民』退到黃線外面去」這樣的說法。其後「鄉民」一詞就從早期帶有負面意涵的符號，逐漸變成 PTT 使用者所認同的自稱。甚至 PTT 站方還在 2011 年推出了「ptt 鄉民認同卡」。一般認為，「鄉民」一詞源自於周星馳電影《九品芝麻官》中的一句台詞：「我只是跟鄉民進來看熱鬧的。」這樣的淵源是否與周星馳的電影台詞很容易在 PTT 中引發推文的起鬨現象仍值得考察。
- 〔3〕 這一概念最早由黃厚銘（2010）提出，其後黃厚銘與林意仁（2013）又進一步地將其運用在 PTT 鄉民文化的分析上。
- 〔4〕 也因此，Highmore（2002: 159）在詮釋 de Certeau 提出的「戰略」與「戰術」這組概念時，也特別強調，雖然這組概念所產生的那種日常生活與戰爭之間的關聯，確實在突顯出行動之間的形式差異上有所幫助，但是其「代價」即是導致無益的混淆。...戰爭隱喻的延伸暗示著過多的意圖性對抗（purposeful opposition）。而在本文看來，從一種「非對抗性」抵抗的角

度出發來解讀「戰略」與「戰術」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可以將「戰略」視為是制度化的「規訓」運作機制的核心，而相對地，「戰術」也就是那些較不可見的「反規訓」實作，它們實際上並不意圖於革命性地顛覆既有體制，而是試圖在規訓權力無所不在的「必然界線」之間迴避、遁逃，也就是尋找「不那樣」被宰制的逾越可能性。

- 〔5〕 LOH 為“Lin only haters”的縮寫，也就是討厭林書豪的人，中文也稱之為“林酸”。
- 〔6〕 根據 PTT 鄉民百科，反串文的定義為：是指本身並非具有某種身分或立場，但卻假裝自己是該身分立場的人來發言，以達到某種目的。
- 〔7〕 由於此篇文章在後來被板主刪除，因而無法擷取原始畫面。從筆者留存的文字紀錄來看，這一接龍起鬨實際上持續了近半小時（08:31~08:59）。
- 〔8〕 「美江」指的是約莫發生於 2013 年 12 月的郭美江牧師傳道事件，由於這一事件本身極具爭議性，而其傳道的內容又相當獨特，因而後來在 PTT 上經常引發鄉民們的「惡搞」。
- 〔9〕 實際上也在此愛恨交織與不斷藉由起鬨來創造出歧出與差異的現象中，再次凸顯出過去以「虛擬社區」的概念來描繪網路人際關係之限制。簡言之，將虛擬社區拿來與傳統社區相比較，不論是主張兩者相同、或是不同，皆是以傳統社區的同質性與一致性為比較基準。但藉由起鬨來生產差異，卻結合了共感共應與歧出。因此，這也顯示出以流動的群聚（mob-ility）重新面對與介入虛擬社區的「社區議題」所能帶來的啟發。
- 〔10〕 關於 Vattimo 如何將「多元性」看作是當代可能的規範性判準，請參照黃厚銘（2014）的文章〈資訊時代的最低限倫理：G. Vattimo《透明社會》的詮釋倫理與多元主義〉。

## 參考書目

- 李紹良 (2012)。《十五萬人的 BBS 是如何煉成的：批踢踢實業坊技術演變歷程之研究》。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意仁 (2011)。《網路群眾文化及其民主意涵：以 PTT Gossiping 看板為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厚銘 (2014)。〈資訊時代的最低限倫理：G. Vattimo《透明社會》的詮釋倫理與多元主義〉，《傳播研究與實踐》，4 (1)：173-187。
- 黃厚銘、林意仁 (2013)。〈流動的群聚 (mob-ility)：網路起鬨的社會心理基礎〉，《新聞學研究》，115：1-50。
- Buchanan, I. (2000). *Michel de Certeau: Cultural theorist*. London: SAGE.
-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 Rendall,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ardiner, M. (2000).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 Heim, M. (1993). *The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ghmore, B. (2002).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Lyon, D. (2001). *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Lyotard, J.-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G. Bennington & B.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Rheingold, H. (2000).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Turkle, S.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Vattimo, G. (1992).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D. Webb,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